

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建立的标志

王照年 罗玉梅

摘要: 宋初三馆迁入崇文院后变化很大, 仅以藏书制度建树的角度讲, 最大的举措莫过于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及其所属的藏书库。这标志着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 促使此前历代皇家藏书与国家藏书处于难分彼此的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只是符合了那个时代皇家典藏的现实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发挥了典籍本身的功用——较为广泛地服务于更多的上层文士, 有效地推动了北宋右文政策的实行, 其影响特为深远。

关键词: 国家藏书制度; 崇文院; 秘阁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3)06-0275-05

有宋一代, 尤重典籍, 国家藏书一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如明人胡应麟《书厄论》称两宋图籍之盛曰“宋世图史, 一盛于庆历, 再盛于宣和, 而女真之祸至矣; 三盛于淳熙, 四盛于嘉定, 而蒙古之师至矣。”^①深入考察当时能够有效地利用丰盛的国家藏书创造出值得后世称颂的文化功绩, 除朝廷重视文化建设的政治影响、雕版印刷盛行的科技因素之外, 首先与之有着直接关系的, 应该是创建了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宋初的国家藏书制度, 在经历了前代藏书制度到新建崇文院藏书制度的初创阶段之后, 又在太宗时期新建秘阁, 标志着有别于前代的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这一点, 本文以记述北宋馆阁藏书与制度方面具有专门性史料价值^②的《麟台故事》所载为主, 再参以其它相关文献即可得到更为清晰的实证。

一、三馆迁入崇文院后的变化

(一) 御赐名号“崇文院”的重要性

宋初近二十年, 沿袭着唐五代的馆阁旧制, 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并处于后周以来的旧址之上, 馆阁馆职之称依旧如故。三者之间的先后秩次虽早已分定, 但在职掌朝廷具体事务中所具有的职能、性质等几乎相差无几, 均为大致相当的三个以藏书为主的文化部门。若深究三者的细微区别, 那也只不过是不同的情况下, 各自承担朝廷文化事务的某一方面, 或者某一具

基金项目: 2012年度闽南师范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 SX12004)。

作者简介: 王照年, 文学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罗玉梅, 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

体过程中各自职掌职事有所侧重而已。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三馆共同迁入刚刚竣工的崇文院新址后,各自所设馆职的称号和机构设置不仅依然没有什么变动,而且还在崇文院中仍旧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藏书库,表面上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其实则不然,因自此以后的三馆共处于一院之内,三馆即为崇文院,故有“三馆通名之曰崇文院”^③之说。其实,当时世人眼目中的崇文院,俨然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特别是当时崇文院的居址比邻皇宫,屋舍高大威严而又辉煌,建造规格远远高于其它中央机构的办事处所,更有太宗皇帝御赐御书的名号——崇文院。真所谓“太宗皇帝待遇三馆特厚”^④之由来已久,此举之重要性自当毋庸置疑。

总之,三馆通称为崇文院的情况,远非表面上有了某一种称谓的变化那么简单,其重要性在于朝廷把崇文院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不同于其它常设性中央政府机构进行创建。此举至少从形式上,先通过崇文院把三馆已经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以共同担负国家藏书为主体性质的文化机构;然后日益尊崇,令其声势渐趋显赫,促使其成为集珍藏典籍并利用其创造新的文化、储育人才以备皇帝顾问的文化部门;最终朝廷才能够真正借助其推行右文政策,切实扭转唐五代以来武人一贯拥兵自重而左右朝政的局面。

(二) 崇文院成为国家总的册府之所

三馆迁入崇文院后,实则“合为一矣”^⑤,仅以三馆布局在崇文院中的独立藏书库为例,便足以说明问题。如仅从表面上来看,寓居于崇文院内的三馆似乎是独立的、互不相属的三个部分:昭文馆有一个书库,处在崇文院的东廊;集贤院有一个书库,处在崇文院的南廊^⑥;史馆有四个书库,处在崇文院的西廊,且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准分藏为四库。不过从新建崇文院的实质而言,当时的三馆同寓一院,其贮藏于崇文院中的全部六库书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诸如当时统计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图书总量时,便是如此,“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册府之文焕乎一变矣。”^⑦此外,在三馆整体迁入崇文院后的当年,有一批新增加典籍归入时,亦云“两浙钱俶归朝,遣使收其书籍送馆阁,用雕木为架,以青绀帕幕之,简策之府翕然一变矣。”^⑧

可见,三馆共处于崇文院内,典籍珍藏方面所发生的一些实质性变化,足以向朝廷内外表明:崇文院在整体上已成为国家总的册府之所,也是唯一的规格级别最高的国家典籍之府。

二、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作为具有北宋特色,而且有别于之前的历代国家藏书制度——以馆阁为核心藏书制度的正式确立,还是通过崇文院中新建秘阁来完成的。特别是从藏书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三馆迁入崇文院之后,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使此后皇家藏书与国家藏书开始有了明确的分野,这标志着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

(一) 新建秘阁的重要性

端拱元年(988)五月五日,在崇文院中堂新建秘阁,从三馆中精选出当时堪称为真本或者善本的书籍、有名的前贤字画等归属秘阁珍藏和管理,并设有与三馆馆职大致相同的秘阁馆职。后在淳化元年(990)诏定秩次居于三馆之后,亦可称为四馆,合则称“馆阁”。只不过当时秘阁职官设置虽然俱全,也拥有自己的典藏,但实际的情况乃是秘阁处在崇文院中堂,“层构未立,书籍止局偏厅庑廊内”。^⑨直到淳化三年五月,才下诏在崇文院中增修秘阁。当年八月阁成,太宗既御书名号“秘阁”二字以赐直秘阁李至,又在右仆射李昉等臣僚的极力恳请下亲为之作《赞》,并刻石于秘阁下,是为之记。可见,朝廷对秘阁的重视程度之高异乎寻常。

另外,崇文院中新增秘阁之举的影响之大,在宋人的公私文牍中均有记载。如据《麟台故事》残本卷一《官联》篇载:

秘阁。端拱元年^⑩，于崇文院中堂建，择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诏次三馆，直阁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掌缮写、储藏、供御典籍图书之事；判阁一人，旧常以丞、郎、学士兼秘书监领阁事，大中祥符九年后，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判。国初，又置秘阁校理，通掌阁事，咸平后者皆不领务。^⑪

又据《玉海》引与《麟台故事》著者程俱同时期人叶梦得之语曰：

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⑫

再据与程俱著述《麟台故事》时所选材大致同源的《宋会要辑稿》载：

太宗端拱元年五月，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凡史馆先贮天文、占候、讖纬、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亦一时之妙也。是月，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及提辖秘阁供御图书，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史馆检讨杜镐充校理，此盖设官之始也。^⑬

总之，建秘阁的目的是为了专供皇帝御览，故其所藏典籍是从三馆中精选出来的珍品和逐渐收集起来的以宋太宗所作为主的御制之作，相对较为珍贵。同时，秘阁也和三馆一样，担负着为国家储备人才的使命，既设置秘阁馆职，又诏试文臣名儒入阁供职。准确地讲，当时的秘阁实为太宗皇帝专用的藏书之府，秩次虽在三馆之后，合称之为馆阁，但秘阁所藏典籍实乃三馆中精选出来的当世之珍品。其中有“晋王羲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太宗、明皇、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顾恺之画《维摩诘像》、韩干《马》、薛稷《鹤》、戴松《牛》及近代东丹王李赞华《千角鹿》、西川黄筌《白兔》，亦一时之妙也”。^⑭诸如此类的贵重典藏，所服务的对象自然是皇帝或皇家，再到后来秘阁便成为主要珍藏精善典籍和供奉太宗御书御制品的专署，足见其重要性绝非一般。

（二）秘阁有别于三馆的特殊性

在诸多方面，秘阁虽与三馆类似，但又与三馆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它已经不是一般文臣可以随便介入的场所。如《麟台故事》辑本卷五《恩荣》载：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至召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谏议、舍人等诣阁观御书图籍。帝知之，即召内品裴愈就赐御筵，出书籍令纵观，尽醉而罢。二日，又召权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馆学士纵观，赐宴如前。帝作赞赐之，宰臣李昉等请刻石阁下。李至上表，引唐秘书省有薛稷画鹤、郎余令画凤、贺知章草书，当时目为三绝；又引颜真卿请肃宗题放生池碑额及近时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乞御书飞白书“玉堂之署”为比，愿赐新额，以光秘府。诏中书、枢密院、近臣观新阁，又赐上尊酒，大官供膳。是日，遣中使赍御飞白书“秘阁”二字以赐李至，李昉等相率诣便殿称谢。退就饮宴，三馆学士预焉。又赐御赞以美其事，李至上表谢，仍请以御制《赞》刻石秘阁。^⑮

其实，该条下四库馆臣据宋释文莹《玉壶清话》所载此事来看，八月一日并非李至主动召集或邀请李昉、宋琪、侍徐铉等人，而是这一班文人在没有向皇帝请示的情况下，因雅兴所至，强烈要求专掌秘阁书籍的李至打开新建的秘阁，一观秘阁藏书。然而，李至乃是一个极为小心谨慎之人，一再推辞说“扃钥诚某所掌，籤函中冓，严秘难启，奈诸君非所职，窥不便。”李昉等三人笑着对李至说“请无虑，主上文明，吾辈苟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于是便顺势强拉着李至进入秘阁观书。李至无奈之下，暗遣阁使密奏宋太宗。太宗闻知此事，非但不加追究，反而以此为契机，顺势倡导崇文之意，故才有连日盛宴款待馆阁文臣及飞白御书秘阁匾额的佳话。不过，此事也正好从侧面证实：即便是当朝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徐铉等这样级别的重臣，若要进入三馆书库借阅书籍，应该是理所当然而本无问题可言之事，但要进入

秘阁观书,必须得有皇帝恩准才行。由此可见,秘阁与同处在崇文院中的三馆相比,更是有着不同于寻常的特殊性——完全具有那个时代所不可或缺的皇家藏书之特色。

(三) 秘阁使崇文院的社会政治地位攀升

鉴于秘阁建立后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崇文院在朝野的地位和影响愈加不同凡响。淳化元年八月^⑩,时任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等向太宗上书建言:

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直未央宫,即麒麟、天禄阁在其中;命刘向、杨雄典校,皆在禁中书,即内库书也。东汉藏之东观,亦在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分秘书为中书,而秘书监掌艺文图书之事,后以秘书树少府,故王肃为秘书监,表论秘书不应属少府,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应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有所藏之书,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于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故晋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料秘阁四部三万余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补秘阁之遗迹;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炀帝即位,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于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五年,亦于乾元殿东廊写四库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至十三年,乃以集仙殿为集贤殿,因置及贤书院。虽沿革不常,然则秘阁之书皆置于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籍之物,荡然流离,近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弊之末,复兴经籍,三馆之书,访求渐备,陛下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于宸心,非因群下之议也。况睿藻宸翰,盈编积简,则其奥秘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建置之后,寒暑再周,顾其官司,未详所处,乞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至于高下之次,先后之称,亦昭示明文,著为定式,其秘书省既无书籍,原隶京百司,请如旧制。^⑪

李至等的建言,在总结汉至宋代国家藏书的演变大致经过中,可以很确定地看到“秘阁”之号始于晋,由其所演化而来的宋初的秘书省,又与宋前相比而言,已不属于藏书机构。宋初的秘阁藏书作为“王者藏书”,表面上看似沿袭了前代,但秘阁藏书新建在崇文院中,又与宋前有所很大的不同。即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致使此前历代皇家藏书与国家藏书难分彼此的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只是符合了那个时代皇家典藏的现实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发挥了典籍本身的功用——三馆与秘阁的藏书均在崇文院内,区分在于:秘阁藏书乃当时北宋典藏中堪称精华和极品的部分^⑫,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帝王;三馆的藏书比较丰富而精善,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朝廷所选任的馆阁文士,当然其他臣僚亦可按照规定入三馆观书、借书等。也正是在秘阁与三馆藏书有了明确的分野之后,宋代的皇家典藏与国家藏书也有了较为确定的界限。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即便是三馆所藏典籍一般情况下仍旧不可能更多地服务于广大社会文士,但是在着力推动北宋右文政策的贯彻落实方面,所发挥出来的重大作用确实无法估量。因为此举特为关键之处就在于:以馆阁为依托,能够把天下最为优秀的文士与国家甚为精善的典籍有效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为宋代创造出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⑬的辉煌成就提供了可能。

也正是由于李至等的这一建言,朝廷更进一步确定了馆阁之间的秩次。即太宗降诏曰:“朕肇兴秘府,典掌群书,仍选名儒,入直于内,文籍大备,灿然可观。处中禁以宏开,非外司之为比。自今秘阁直次三馆,其秘书省依旧属京百司。”^⑭此后的三馆秘阁合称之为“馆阁”,也是崇文院的别称,实实在在成为北宋国家典籍之府。

可见,崇文院中新建秘阁之重大意义在于:标志着北宋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的正式确立。在当时而言,此举似乎是表面上提升了馆阁文士的社会政治地位和进一步明确了崇文院典藏的不同功能;但以后世观之,此举不仅切实为后来北宋国家藏书及其制度的发展完善

创造了优越的条件^② ,而且为有宋一代之所以能够创制出后世深加叹赏的文化功绩 ,形成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结 语

从北宋藏书制度建设的角度讲 ,秘阁的建立意味着其切实承担起了当时皇家藏书的重任 ,从而之前延续的三馆之设 ,因其主要服务于在朝文臣 ,故相对而言更多地担负着国家藏书的职能。如此一来 ,之前历代皇家藏书与国家藏书实即一也的状况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即以馆阁为核心的藏书制度的建立 ,不只是符合了那个时代皇家典藏的现实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发挥了典籍本身的功用——较为广泛地服务于更多的上层文士 ,有效地推动了北宋右文政策的实行 ,其所产生的影响特为深远。直至数百年后 ,清代乾隆皇帝时 ,还认为文渊阁的各项制度应参照宋制。时至今日 ,仍然会有许多重要方面值得借鉴。

注释:

①(明)胡应麟《书厄论》,收于徐雁、王燕均《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②王照年《程俱及其〈故事考论〉》,《历史文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③⑪⑰⑱(宋)程俱《麟台故事(残本)》,商务印书馆1944年发行《四部丛刊续编》本,第1、1、4、5页。

④⑭⑮(宋)程俱(清)四库馆臣辑《麟台故事(辑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发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95册),第332、306、332页。

⑤⑧⑨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79、2779、2778、2778页。

⑥据《宋会要辑稿》第七十册《职官》一八之五〇《崇文院》载“南廊为集贤书库。”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79页。又据(宋)孙逢吉撰《职官分记》卷十五《崇文院》载“南廊为集贤书库。”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发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923册)第206页。再据(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太宗》,见太平兴国三年“二月丙辰朔”条载“南廊为集贤书。”中华书局1992年,第422页。此三者所载均同,但龚延明编著《宋代官职辞典》“集贤院”条云“南藏书之府,以崇文院东廊为集贤院书库《分记》卷15《崇文院》。”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0页。可见,此引“东廊”者不确,应为“南廊”之误。

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2页。

⑩据(宋)程俱撰《麟台故事》残本卷一上《官联》篇和《麟台故事》辑本卷四《官联》篇均作“二年”,应误。秘阁建于端拱元年应为不之争之实,故引文中暂移正为“元年”。残本见《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辑本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发行,595册307页。

⑫(宋)王应麟《玉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发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974册),第314页。

⑬原文作“端拱二年八月”。据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认为:端拱二年八月“淳化元年八月。”张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故依据之。且据李至建言中有“然自建置之后,寒暑再周”一语,亦可推断应为淳化元年(990)八月,这是因为秘阁是在端拱元年(988)建于崇文院中,至端拱二年时才一年余,应当与李至所言“寒暑再周”不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页。

⑭王照年、罗玉梅《〈麟台故事〉载北宋馆阁藏书的形成》,《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12期。

⑮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⑯王照年、罗玉梅《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完善》,《图书与情报》2012年第1期。